

中国近代史教学参考资料

(下 册)

南 京 大 学 历 史 系 合 编
江 苏 师 范 学 院

下 册 目 录

六、戊戌变法

康有为等：公车上书·····	(1)
严 复：辟 韩·····	(26)
严 复：译《天演论》自序·····	(30)
谭嗣同：仁学自序·····	(33)
梁启超：变法通议自序·····	(35)
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	(37)
张之洞：劝学篇（选录）·····	(43)

七、

义和团告白·····	(46)
马兰村坎字团告示·····	(47)
刘青田碑文·····	(48)
义和团揭帖·····	(49)
义和团痛斥李鸿章等揭帖·····	(50)
义和团揭帖·····	(51)
曹福田致各国战书·····	(52)
驻北京公使急件（节录）·····	(53)
严禁拳民滋事保护教堂教民谕旨·····	(55)
以外邦无礼横行当召集义民誓张挾伐谕旨·····	(56)

军机处寄各省督抚等电旨·····	(58)
军机处寄出使俄国大臣杨儒等电旨·····	(59)
刘坤一 张之洞：沥陈拳会难恃外衅勿开联络洋人 力保长江会銜电奏·····	(61)
团 规·····	(63)
美总领事古纳致克雷特第三副国务卿的报告·····	(65)
〔德〕瓦德西：关于帝国主义侵略联军在中国大肆抢 劫的报告·····	(67)
〔德〕瓦德西：论瓜分中国事·····	(70)
各国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通谕天下旨·····	(74)
辛丑条约·····	(76)
直隶深州安平联庄会“扫清灭洋”起义·····	(83)
袁世凯：复陈剿办广宗等县匪徒情形折·····	(84)
河南西平苗金声“扫清灭洋”起义·····	(87)

八、辛 亥 革 命

盛京将军增祺等奏“忠义军”等部屡与俄军接仗情形折··	(88)
库罗巴特金日记（节录）·····	(91)
俄关东总督致增祺战线内有碍军务城塞随时拆毁照会··	(92)
第一次日俄密约·····	(93)
铁血会檄·····	(94)
兴中会宣言·····	(95)
敬告同乡书·····	(97)
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100)
附：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 立宪不可行革命书（节录）·····	(113)

邹 容：革命军（节录）	(126)
陈天华：警世钟（节录）	(145)
孙 文：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	(157)
孙 文：同盟会宣言	(159)
孙 文：民报发刊词	(162)
孙 文：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	(164)
《民报》与《新民丛报》辨驳之纲领	(173)
孙 文：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	(175)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77)
孙 文：提倡民生主义之真义	(182)
光绪帝忠君尊孔上谕	(184)
载 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	(185)
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 报告（节录）	(189)
沙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上沙皇奏	(190)
沙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的报告（节录）	(192)
沙俄驻华公使克鲁平斯基的报告（辑录）	(193)
英使朱迺典致英外部葛垒电	(194)
英外部葛垒致英使朱迺典电	(195)
德驻京公使哈豪森致外部电〔译文〕162号	(196)

九、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

袁世凯：莅任正式大总统宣言（节录）	(197)
袁世凯：大总统祭圣告令	(200)
第三次日俄密约	(201)
中俄声明文件	(202)

北洋政府外交部致驻英公使电·····	(204)
二十一条·····	(205)
白朗告示·····	(208)
国民党组党宣言·····	(210)
孙 文：致黄兴书·····	(214)
孙 文：中华革命党宣言·····	(216)
孙 文：第二次讨袁宣言·····	(218)
陈独秀：敬告青年·····	(221)
张勋奏请复辟之原折·····	(227)
孙中山等反对张勋复辟·····	(229)
孙 文：护法宣言·····	(230)
孙 文：辞大元帅职通电·····	(232)
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	(234)
鲁 迅：狂人日记·····	(239)
天津法租界罢工风潮（辑录）·····	(249)
江南造船所罢工风潮·····	(256)
一九一二——一九一九年五月的罢工次数·····	(258)

六、戊戌变法

公车上书

康有为等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1895年5月2日）

具呈举人康祖诒等，为安危大计，乞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呈请代奏事：窃闻与日本议和，有割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补兵饷二万万两及通商苏、杭，听机器洋货流行内地，免其厘税等款，此外尚有缴械、献俘、迁民之说。阅《上海新报》天下震动，闻举国廷诤，都人惶骇。又闻台湾臣民不敢奉诏，思戴本朝。人心之固，斯诚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覆，数百年而俱此。然伏下风数日，换约期迫矣，犹未闻明诏赫然峻拒日夷之求，严正议臣之罪。甘忍大辱，委弃其民，以列圣艰难缔构而得之，一旦从容误听而弃之，如列祖列宗何？如天下臣民何？然推皇上孝治天下之心，岂忍上负宗庙，下弃其民哉！良由误于议臣之言，以谓京师为重，边省为轻，割地则都畿能保，不割则都畿震惊，故苟从权宜，忍于割弃也。又以群议纷纭，虽力摈和议，而保全大局，终无把握，不若隐忍求和，犹苟延旦夕也。又以为和议成后，可十数年无事，如庚申（咸丰十年，1860年）以后也。左右贵近，论率如此。故盈廷之言，虽切而不入；议臣之说，虽辱而易行；所以甘于割地弃

民而不顾也。

窃以为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举人等栋折榱坏，同受倾压，故不避斧钺之诛，犯冒越之罪，统筹大局，为我皇上陈之。

何以谓弃台民即散天下也？天下以为吾戴朝廷，而朝廷可弃台民，即可弃我；一旦有事，次第割弃，终难保为大清国之民矣。民心先离，将有土崩瓦解之患。《春秋》书梁亡者，梁未亡也，谓自弃其民，同于亡也。故谓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日本之于台湾未加一矢，大言恫喝，全岛已割。诸夷以中国之易欺也，法人将向滇、桂，英人将向藏、粤，俄人将向新疆，德、奥、意、日、葡、荷皆狡焉思启。有一不与，皆日本也，都畿必惊。若皆应所求，则自啖其肉，手足腹心，应时尽矣，仅存元首，岂能生存！且行省已尽，何以为都畿也？故谓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此理至浅，童愚可知，而以议臣老成，乃谓割地以保都畿，此敢于欺皇上、愚天下也。此中国所痛哭，日本所阴喜，而诸国所窃笑者也。

诸夷知吾专以保都畿为事，皆将阳为恐吓都畿而阴窥边省，其来必速。日本所为日日扬言攻都城，而卒无一炮震于大沽者，盖深得吾情也。恐诸夷之速以日本为师也，是我以割地而鼓舞其来也。皇上试召主割地议和之臣，以此诘之，度诸臣必不敢保他夷之不来，而都畿之不震也。则今之议割地弃民何为乎？皇上亦可以翻然独断矣。或以为庚申和后二十年，乃有甲申（光绪十年，1884年）之役，二十年中可图自强，今虽割弃，徐图补救。此又敢以美言欺皇上、卖天下者也。

夫治天下者势也，可静而不可动，如箭之在楫，如马之在埒，如决堰陂之水，如运高山之石，稍有发动，不可禁压。当

其无事，相视莫敢发难，当其更变，朽株尽可为患。……甲午（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前，吾内地无恙也，今东边及台湾一割，法窥滇、桂，英窥滇、粤及西藏，俄窥新疆及吉林、黑龙江，必接踵而来，岂肯迟迟以礼让为国哉？况数十国之逐逐于后乎？譬大病后，元气既弱，外邪易侵，变症百作，岂与同治之时，吾国势犹盛，外夷窥伺情形未迨比哉！且民心既解，散勇无归，外患内讷，祸在旦夕，而欲苟借和款求安目前，亡无日矣，今乃始基耳。症脉具见，不待卢扁，此举人等所为日夜忧惧，不憚僭越，而谋及大计也。

夫言战者，固结民心，力筹大局，可以图存；言和者，解散民体，鼓舞夷心，更速其亡。以皇上圣明，反复讲辩，孰利孰害，孰得孰失，必当独断圣衷，翻然变计者。不揣狂愚，统筹大计，近之为可战可和，而必不致割地弃民之策，远之为可富可强，有必无敌国外患之来。伏乞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而已。

何谓鼓天下之气也？天下之为物，譬犹器也，用其新而弃其陈，病乃不存。水积为淤，流则不腐；户闭必坏，枢则不蠹；炮烧则晶莹，久置则生锈；体动则强健，久卧则委弱。况天下大器，日摩洗振刮，犹恐尘垢，置而不用，坏废放失，日趋于弊而已。今中国人民咸怀忠义之心，非不可用也，而将吏贪懦，兵士怯弱，乃至闻风譁溃，驯至辱国请和者，得无皇上未有以鼓其气耶？是有四万万之民，而不善用之也。伏念世祖章皇帝手定天下，开创之圣人也，而顺治十八年中，责躬之诏屡下。穆宗毅皇帝手定艰难，中兴之盛功也，而同治元二年（1862年—1863年）间罪己之诏至切。天下臣民，伏读感泣，踊跃愤发，然后知列圣创定之功所由来也。《传》谓“禹、汤罪己，兴也勃焉”。唐臣陆贽谓“以言感人，所感已浅，言犹

不善，人谁肯怀？”今日本内犯，震我盛京，执事不力，丧师失地，几惊陵寝，列圣怨恫。皇上为人子孙，岂无有震动厥心者乎？然于今经年，未闻有罪己之诏，责躬咎厉，此枢臣辅导之罪，宜天下之有望于皇上也。

伏乞皇上近法列圣，远法禹、汤，特下明诏，责躬罪己，深痛切至，激厉天下，同雪国耻，使忠臣义士读之而流涕愤发，骄将懦卒读之而感愧忸怩。士气耸动，慷慨效死，人怀怒心，如报私仇，然后皇上用其方新之气，奔走驰驱，可使赴汤蹈火，而岂有闻风哗溃者哉？此列圣善用其民之成效也，故罪己之诏宜下也。皇上既赫然罪己，则凡辅佐不职、养成溃痛、蔽惑圣聪、主和辱国之枢臣，战阵不力、闻风逃溃、尅扣军饷、丧师失地之将帅，与夫擅许割地、辱国通款之使臣，调度非人、守御无备之疆吏，或明正典刑，以寒其胆，或轻予褫革，以蔽其辜，诏告天下，暴扬罪状。其余大僚尸位，无补时艰者，咸令自陈，无妨贤路。庶几朝政肃然，海内吐气，忭颂圣明，愿报国耻，此明罚之诏宜下也。

大奸既黜，典刑既正，然后悬赏功之格，为不次之擢。将帅若宋庆、依克唐阿，疆吏若张之洞、李秉衡，凉山旧功若冯子材，皆有天下之望，宜有以旌之。或内综枢柄，或外典畿疆，以鼓舞天下。夫循资格者可以得庸谨，不可以得异材；用耆老者可以为守常，不可以为济变。不敢言远者，请以近事言之。当同治初年，沈葆楨、李鸿章、韩超皆以道员擢为巡抚，阎敬铭则由臬司擢抚山东，左宗棠则以举人部员赏三品卿督办军务，刘蓉且以诸生擢四川藩司，逾月授陕西巡抚，用能各展材力，克佐中兴。若汉武帝之用才，明太祖之任吏，皆用不次之拔擢，不测之刑威，用能奔走人才，克成功业。伏读世宗（祖）章皇帝圣训，履诏举天下之才，下至山林隐逸，举贡生监，佐

貳杂职，皆引见擢用，此诚圣主鼓动天下之盛心也。

今日变甚急，天下未为乏才，而未闻明诏有求才之举，似非所以应非常之变也。夫有非常之事变，即有非常之才应之，同治中兴之臣，率多草泽之士。宋臣苏轼谓：“智明勇功之人，必有以养之”。伏乞诏下九卿翰詹科道督抚两司，各举所知，不论已仕未仕，引见擢用，随才器使。昔汉高之于樊哙，每胜增其爵级，其于韩信，一见即拜大将。凡有高才，不次拔擢，天下之士，既怀国耻，又感知遇，必咸致死力，以报皇上，故求才之诏宜下也。夫人主所以驾驭天下者，爵赏刑罚也。赏罚不行，则无以作士气；赏罚颠倒，则必至离民心。今闻日本要我以释丧师之将，是欲以散众志而激民变也，苟三诏既下，赏罚得当，士气咸伸，天下必踊跃鼓舞，奔走动容，以赴国家之急，所谓下诏鼓天下之气者此也。

何谓定天下之本也？自古都畿皆凭险阻，自非周公盛德，不敢以洛邑为都，故娄敬挽辂，汉祖移驾；宋汴梁无险，致敌长驱，徽、钦之辱，非独失德使然也。方今旅顺已失，威海既褻，海险无有，京师孤立。近自北塘、芦台、神堂、涧河，远自山海、抚宁、昌黎、乐亭、清河、蚕沙处处可入，无以为防守之计。此次和议即成，而诸夷窥伺，皆可扬帆而达津、沽。

《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既失矣，国何可守？故今日大计，必在迁都。请以前事言之。我朝当道光之时，天下全盛，林则徐督粤、邓廷桢督闽，叠败英酋朴鼎查、额尔金之兵，而移师天津，即开五口，而补二千万矣。其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咸丰六年（1856年），咸丰八年，皆始战终和，藉京师以为要挟。诸口益开，巨款累偿。暨庚申之变，我文宗显皇帝，至为热河之狩，焚烧御园，震惊宗庙。至今万寿山营缮虽新，余烬尚在。由是洋人掉臂都畿，知吾虚实。此事

非远，皆诸臣所目击，前车易鉴者也。寻五十年来，吾大臣用事及清流进议者，不深维终始，高谈战事，及震动津沽，宫廷惶骇，则必以战无把握，输款求和。于是尸位无耻之流累借和议以容身，朝廷虽深知主战之直，必不见从；亦明知议和之非，俯徇所请。盖实患既至，非复空言所能抵塞。故外夷所累藉以胁制者，皆以吾京师近海之故。彼虽小丑，无求不得；吾虽大胜，终必请和，亦既彰明较著矣。用事者既不早为自强之谋，又不预作迁都之计，夷衅既开，虚矫空谈，相与言战，及稍败衄，震动畏缩；苟幸得和，乃至割根本之地，弃千万之民，而亦为之，其不智而失计亦甚矣。以今事言之，吾所以忍割地弃民者，为保都畿安乘輿也，微论将来外夷继轨，都畿终不能保，乘輿终必致惊，而以区区十里之城，弃千里之地，十兆之民以易之，甚非策也。以后事料之，诸夷知我之专保都畿也，咸借端开衅，阳攻都畿以索边省，我必将尽割沿边十余省，以保都畿，是弃天下万里之地，数万万之民，以易区区之都城也。

夫王者有都以治天下耳，岂有割天下以保都城而恃为至计哉？以五十年来前后今事考之，吾之款和输割，皆为都畿边海之故，其事易徵，其理易明。昔者苟能自强，虽不迁都，犹可立国，今日虽欲自强，而外夷连轨，计不及待，故非迁都，智者无所骋其谋，勇者无所竭其力，必将坐困胁割尽而后已。夫以一都城之故而亡其国，岂不痛哉！故今日犹言不迁都者，非至愚病狂，则甘心鬻国。大臣既不能预鉴于前而至辱国，又不补救于后，必至丧邦。皇上圣明，试以诘难诸臣，当无从置喙，或下群臣集议，当亦从同。而后宸衷独断，定议迁都，以安宗庙而保疆土，无逾于此。或谓我能往寇亦能往，我迁都以避，寇深入以争，自古迁都之谋，皆遂为偏安之计，此明臣于

謙所以力爭，而庚申所以止議也。不知古今异形，今昔殊勢，外夷政由議院，愛惜民命，用兵甚慎，不敢深入，與古不同，今日本用兵已可概見。我即遷都，可以力戰，雖沿邊糜爛，而朝廷深固，不為震懾，即無所脅制，主和者無所容其身，主戰者得以激其氣，豈不鑒于五十年事，而尚以為孤注哉！獨不畏微、欽之辱乎？

或謂國君有死社稷之義，此尤不達經議之謬言也。夫國君者諸侯之謂，以社稷受之天子，當死守之，猶今地方有司，有城池之責比耳。若天子以天下為家，四方皆可建都立社，何一城之為？明庄烈帝既為愚儒所誤，明社遂屋。豈可復以此再誤我國家哉！且一朝而有數都，自古為然，商凡七遷，周營三邑，漢室二京，唐世兩都，及明祖定鼎金陵，永樂乃遷燕蓟，以太子留守南京，宮殿官僚，悉仍舊制，擇有司扈從，行在廟社官署，隨時增修，永分兩京，可以為法。若夫建都之地，北出熱河、遼、沈，則更迫強敵；南入汴梁、金陵，則非控天險；入蜀則太深，都晉則太近。天府之腴，崤、函之固，莫如秦中。近雖水利不開，漕運難至，然都畿既建，百貨自歸，若藉機器、督散軍，亦何水利之不開哉？

夫京都建自遼、金，大于元、明，迄今千年，精華殆盡。近歲西山崩裂，屢年大水，城垣隳圯，閭閻房屋，傾壞無數。甚者太和正門、祈年法殿无故而災，疑其地氣當已泄盡。王者順天，革故鼎新，當應天命，謂宜舍燕、蓟之舊京，宅長安為行在。然人情乐于守常，难于移動，以盤庚遷殷，誠諭至煩三造；以魏文遷洛，世臣猶有違言。蓋世臣大家，輜重繁多，迁徙不易，听其恋旧，庶免阻挠，自非大有为之君，不易破尋常之論。魏文南征，永樂北伐，皆借巡幸留而作都。皇上既讲明利害，远之防诸夷之联鑣，近之拒日本之挟制，急断乃成，亟法

汉高，即日移驾奉皇太后巡于陕西，六龙西幸，万人欢庆。幸当议和之时，民心稍静，择亲藩之望重者留守旧京；车驾从容西狩，择百司扈从，以重兵拥卫，必不虑宵小生心。日人虽欲轻兵相袭，数日乃抵津、沽，而我大兵云集都畿，犹可一战，彼岂敢深入内地，飞越四天门潼关之险哉？然后扼守函、潼，奠定丰、镐，建为行在，权宜营置，激厉天下，妙选将才，总屯重兵，以二万万之费改充军饷，示之以虽百战百败，沿海糜烂，必不为和。日本既失胁制之术，即破旧京，不足轻重，必不来攻，都城可保。或俯就驾馭，不必割地，和议亦成；即使不成，可以言战矣。故谓迁都以定天下之本者此也。

何谓强天下之势也？凡两物相交，必有外患，兽有爪牙之卫，人有甲冑之蔽，列国并立，兵者国之甲冑也。昔战国之世，魏有武卒，齐有轻骑，秦有武士。楚庄投袂，屢及剑及，即日伐宋。盖诸国并骋，无日不训讨军实，国乃可立。今环地球五十余国，而泰西争雄，皆以民为兵。大国练兵至百余万，选兵先以医生视其强弱，乃入学堂学习布阵骑击测量绘画。其阵法营垒器械枪炮，日夕讲求，确有程度。操练如真战，平居如临敌，所由雄视海内也。日本步武其后，遂来侮我。而我犹守大一统之旧以待之，不训兵备，至有割地款和之事。今日氛未已，不及精练，然能将卒相知，共其甘苦，器械精利，壮其胆气，亦自可用，选将购械，犹可成军。

夫用兵者，用其气也。老将富贵已足，无所愿望，或声色销铄，精气竭衰，暮气已深，万不能战。即或效忠，一死而已，丧师辱国，不可救矣。近者杨芳失律于粤城，鲍超骄蹇于西蜀，令彼再如为兵时跳身坐炮眼上，岂可得哉？此赵惠所以致疑于廉颇，光武所以不用马援也。伏读圣祖仁皇帝圣训，亦以老将气衰不能用，此真圣人之远谟也。惟少年强力，贱卒怀

赏，故敢轻万死以求一生。故选将之道，贵新不贵陈，用贱不用贵。且外夷战备日新，老将多恃旧效，昧于改图，故致无功。今请更练重兵，以待敌变。都畿根本至重，必有忠勇谋略下士爱民之督抚如李秉衡之流者，专督畿辅之军，假以便宜，令其密选将才十人，不拘资格，各练十营，日夜训练，厉以忠义，激以国耻，择其精悍，优其饷糈，以为选锋。既有李克用之义儿，李成梁之家丁，缓急可恃，得此五万，都畿可守，再有将才，可以续练。前敌之宋庆、魏光燾、李光久，宿将之冯子材，并一时人望，可咨以将才，假以便宜。悉用选锋，厉以仇耻。沿边疆臣，亦宜选振作有为之人，不宜用衰老资格之旧，各选将才，各练精兵万人。并饬绅士各自团练，遇有警迫，坚壁清野。并请勅下群臣，外至守令，传谕绅士有忠义沈毅慷慨知兵之士，不拘资格，悉令荐举，引见拔用，或交关内外军差遣。各县草泽中，皆有魁梧任气忠勇谋略之士，责令州县各荐一人，拔十得一，才不可胜用，必有干城之选，足应国家之急者。是谓选将。

管子谓“器械不精，以卒予敌”。外国讲求枪炮，制作日新。枪则德有得来斯枪、毛瑟枪，法有沙士钵枪，英有亨利马梯尼枪，美有哈乞开司枪、林明敦枪、秘薄马地尼枪，俄有俾尔达奴枪，而近者英之黎姆斯枪为尤精。炮自克虏伯炮、嘉立炮外，近有毒烟开花炮、空气黄药大炮，以及暗炮台，水底自行船、机器飞车，御弹戎衣、测量炮子表，巧制日新。日本步武泰西，亦能自制新器，曰苗也理枪。而我中国未能创制，只购旧式，经办委员，不解制造，于坚轻远准速无所谙晓，或以旧枪改充毛瑟，贪其价廉，乃不可用。其中饱者益无论。闻近来所购者，多暹罗废枪，香港以二两八钱购得，而中国以十二两购之。查同治十三年（1874年），德之改法，每分时枪十余

响。光绪三年（1877年），俄之攻土，枪三十余响。至日之犯我，枪乃六十余响。我师溃败，虽将士不力，亦器械不精，故胆气不壮，有以致之。故吾非悬重赏以厉新制，不足取胜。今不及办，宜选精于制造操守廉洁之士，专购英黎姆 斯枪十数万，以备前敌，并广购毒烟空气之炮、御弹之衣，庶器械精利，有恃无恐，是谓购械。又我南洋诸岛民四百万，虽久商异域，咸戴本朝。以丧师割地为诸夷姗笑，其怀愤怒过于内地之民。其人富实巨万之资，以数千计，通达夷情，咸思内归中国，团成一军，以雪国耻。特去天万里，无路自通。若派殷商，密令举办，派公忠智略通达商情之大臣领之，或防都畿，或攻前敌，并令联通外国，助攻日本，或有奇功。所谓练兵以强天下之本〈势〉者此也。

然凡上所陈，皆权宜应敌之谋，非立国自强之策也。伏念国朝法度，因沿明制数百年矣。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官制则冗散万〈漫〉数，甚且鬻及监司，教之无本，选之无择，故营私交贿，欺饰成风，而少忠信之吏。学校则教及词章诗字，寡能讲求圣道，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故空疏愚陋，谬种相传，而少才智之人。兵则绿营老弱，而募勇皆乌合之徒。农则地利未开，而工商无制造之业。其他凡百积弊，难以遍举。而外国奇技淫巧，流行内地，民日穷匮，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即无外衅，精华已竭，将有他变。方今当数十国之觊觎，值四千年之变局，盛暑已至，而不释重裘，病症已变，而犹用旧方，未有不喝死而重危者也。

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言率由而外变相迫，必至不守不

成，言无为而诸国交争，必至四分五裂。《易》曰：“穷则变，变则通。”董仲舒曰：“为政不调，甚者更张，乃可为理。”若谓祖宗之法不可变，则我世祖章皇帝何尝不变太宗文皇帝之法哉？若使仍以八贝勒旧法为治，则我圣清岂能久安长治乎？不变法而割祖宗之疆土，驯至于亡，与变法而光宗朝之威灵，可以大强，孰轻孰重，孰得孰失，必能辨之者。不揣狂愚，窃为皇上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变之之法，富国为先。户部岁入银七千万，常岁亦已患贫。大农仰屋，罗掘无术，鬻官税赌，亦忍耻为之，而所得无几。然且旱潦河灾，船炮巨帑，皆不能举。闻日本索偿二万万，是使我臣民上下，三岁不食，乃能给之。若借洋债，合以利息，扣折百年，亦无偿理，是自毙之道也。与其以二万万偿日本，何如以二万万外修战备，内变法度哉？

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今奇穷之余，急筹巨款，而可以聚举国之财，收举国之利，莫如钞法。令天下银号报明资本，皆存现银于户部及各省藩库，户部用精工制钞，自一至百，量其多少，皆给现银之数，而加其半，许供赋税禄饷。其大者户部皆助资本，其亏者户部皆代摊偿，助其流通，昭彰大信。巨商乐借国力，富户不患倒亏。以十八行省计之，可得万万。既有官银行，上下相通，若有铁路船厂大工，可以代筹军务赈务，要需可以立办。国家借款，不须重息中饱，外国汇款，无须关票作押。公票寄存，可有入息，钞票通行，可扩商务。今各省皆有银票钱票，而作伪万种，利不归公，何如官中为之，骤可富国哉？此钞票宜行一。

可缩万里为咫尺，合旬月于昼夜，便于运兵，便于运械，便于赈荒，便于漕运，便于百司走集，便于庶士通学，便于商

贾运货，便于负担谋生，便于通言语一风俗，有此数便，不费国帑而更可得数千万者，若如铁路。铁路之利，天下皆知。山海关外，久已兴筑。方今运兵，其效已见。所未推行直省者，以费巨难筹耳。若一付于民，出费给牌，听其分筑，官选通于铁路工程者，画定行省郡县官路，明定章程，为之弹压保护。凡军务、运兵、运械、赈荒，皆归官用，酌道里远近，人数繁寡，收其牌费。吾民集款，力自能举，无使外国收我利权。天下铁路牌费，西人计之，以为可得七千万，且可移民出于边塞，而荒地辟为腴壤，商货溢于境外，而穷闾化作富民。俄人琿春铁路将成，边患更迫，但为防边已当亟筑，况可得巨款哉？且可裁漕运而省千万之需，去驿铺而溢三百万之项。此铁路宜行二。

机器厂可兴作业，小轮舟可便通达。今各省皆为厉禁，致吾技艺不能日新，制作不能日富，机器不能日精，用器兵器皆多窳败，徒使洋货流行，而禁吾民制造，是自蹙其国也。官中作厂，率多偷减，敷衍欺饰，难望致精，则吾军械安有起色。德之克虏伯，英之黎姆斯，著于海内，为国大用，皆民厂也。宜纵民为之，并加保护。凡作机器厂者，出费领牌，听其创造。轮舟之利，与铁路同。官民商贾，交收其益，亦宜纵民行之，出费领牌，听其拖驶，可得巨款。此机器轮舟宜行三。

《周官》尹人汉代铁官，开矿之法久矣。美人以开金银之矿，富甲四海；英人以开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均富十倍。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如云南铜、锡，山西、贵州煤、铁，湖广、江西铜、铁、铅、锡、煤，山东、湖北铅，四川铜、铅、煤、铁，其最著者。亘古封禁，留待今日。方今国计日蹙，虽极节俭，岂能济此艰难哉？家有重宝，而仰屋嗟贫无策，甚矣！山西煤、铁尤盛，星罗棋布有百三十万方里，